

布洛克时期砂拉越华人方言经济及其空间价值研究

鲁 政

(闽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 福建 漳州 363000)

摘 要: 布洛克时期, 大批华人移民来到砂拉越地区。他们以方言为社群标识, 参与砂拉越地区经济开发, 形成华语方言与砂拉越门类经济相呼应的空间景观。随着布洛克政府领土拓展, 以巴扎为聚集形式的华人商铺不断出现, 成为砂拉越社会日常民生中的一道华人人文风景。以方言为区别性特征的经济产业及商铺, 构成了布洛克时代砂拉越华人经济独特的聚集模式。它在地理空间、政治空间以及日常生活空间维度上塑造了海外华人独特的区域和人文价值。

关键词: 布洛克时期; 砂拉越; 华人方言群体; 经济开发; 空间价值

中图分类号: F124; H17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9-3907 (2025) 05-0041-06

砂拉越州是马来西亚面积最大的州, 历史上曾隶属于文莱苏丹王国的版图。19 世纪初, 由于文莱苏丹对砂拉越首府古晋的原住民实施税赋政策, 引发了双方严重冲突。1840 年, 英国人詹姆斯·布洛克与文莱苏丹联手镇压了古晋原住民的反抗, 从文莱苏丹手中接管了古晋的管理权。次年, 詹姆斯·布洛克在古晋地区建立布洛克王朝^[1]。随即以古晋为政治中心, 将管理范围逐渐扩大到更广的砂拉越地区。

布洛克执政前, 砂拉越多是未经开发的不毛之地, 不少地方尚存以物易物的原始交易方式。布洛克家族主理古晋后, 积极协同华人发展地方经济。来自多地的华人方言社群, 凭借自身勤奋努力, 为砂拉越地区开发了多门类经济产业, 并创建了大量商铺。不同华人方言社群创造的产业经济以及族群商铺, 成为研究布洛克时期砂拉越华人社会人文的重要媒介。

一、华人方言社群与砂拉越经济互动

(一) 华人方言社群与砂拉越产业开发

方言经济是以方言为纽带形成的具有聚集效应的社会经济。在欠发达的多族群社会, 方言往往体现民族特征, 是识别不同社会群体的主要标志。布洛克执政时期的砂拉越, 除了主政的英国人, 还包括以伊班族为代表的原住民以及来自其他地区的马来人、华人、印度人等。第一代布洛克时期, 有不少华人从荷属西婆罗洲迁往砂拉越地区。至第二代布洛克执政时期, 除了新加坡大量华人进入砂拉越参与生产劳动外, 中国福建、广东两省大量华人群体也陆续抵达砂拉越。这些以闽南语、客家语、粤语等方言为标识的华人社群, 凭借其社群优势, 对砂拉越地区多个产业进行了开发, 形成各方言群体主导不同产业开发的经济现象。

学者山下清海对砂拉越华人方言社群分布进行了研究, 对包括闽南话、潮州话、客家话在内的七种华人方言进行了系统调查^[2]。可以看出, “分时入驻”与“分区分布”是华人在开发砂拉越经济时的基本特征。在砂拉越经济开发过程中, 华人并非一次性大规模涌入, 而是根据方言特征分批到达, 并居住在砂拉越不同区域。这为砂拉越华人方言经济的开拓与发展提供了前提。19 世纪 30 年代前后, 客家人受到荷兰殖民者压迫, 率先从西婆罗洲越界前往砂拉越, 成为砂拉越地区较早有组织的方言社群。他们在石隆门地区成立公司, 主要从事采矿业务。至布洛克时期, 客家人已在石隆门地区扎根, 并成为古晋地区

收稿日期: 2024-11-26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23BYY029)

作者简介: 鲁政 (1983-), 男, 山东烟台人, 讲师, 博士, 主要从事影视与图像传播、视觉语言方向研究。

最大的华人采矿社群。而潮州人进入砂拉越后,较早在砂拉越垦殖胡椒与甘蜜作物,他们会同一部分客家人促进了砂拉越胡椒与甘蜜的开发。到 50 年代,潮州头领刘建发带领的潮州方言群在古晋一带拓荒,他们“在种植甘蜜方面有更突出的表现”^[3]。随着 70 年代后期继任者查尔斯·布洛克(Charles Brooke)的土地政策改革,农业土地开发在砂拉越地区达到新的高度。19 世纪后期,客家与潮州方言群在推动砂拉越的胡椒与甘蜜垦殖方面作出了积极贡献,大量华人投身其中。据相关统计,至 1880 年,仅古晋地区的胡椒与甘蜜园丘就多达 2000 多个^①。擅长经营贸易的闽南人则通过与新加坡的互动,较早在古晋城区设立了贸易据点。他们与另一部分潮州人一起,在古晋市区和砂拉越地区从事多种商业活动。其间,客家、闽南和潮州三个方言社群是砂拉越地区较为活跃的华人群体,他们以方言为聚集特征,在华人社群主导着早期砂拉越的矿业、农业以及商贸产业活动。

进入 20 世纪,布洛克政府的土地开发优惠政策得到广泛实施。第二代布洛克协同华人头领开始从中国直接招募工人,以满足砂拉越经济开发需求。1900 年前后,来自不同地区的多批移民,在头领的带领下,从中国前往砂拉越。来自福州及其周边城市的中国人,在诗巫开辟农场,他们对砂拉越橡胶产业作出了巨大贡献,并形成以福州方言为纽带的橡胶产业开发集群;邓恭叔带领的广东粤语方言群参与了胡椒种植;兴化方言社群迁入砂拉越后,从事渔业工作。据《砂拉越华人史》记录:在砂拉越大规模的商业领域中,广府人常年把持着金行与钟表行业;古晋及美里的锡匠多由客家社群经营,他们也控制着裁缝行业;江浙社群操纵着家私家具行业;咖啡馆生意则是海南社群的“势力范围”;诏安人主要在码头及港口从事搬运工作;煤炭生意多与雷州人有关^{[4]49-64}。这一时期,以方言识别华人经济产业成为砂拉越的普遍现象。而不同方言的分区集聚,进一步突出其在砂拉越的社群识别意义。至布洛克政府统治结束时,“乡族与方言等因素仍然控制着砂拉越的职业的门类性和差异性”^{[4]63}。华人社群的方言性凝聚特征以及华人方言在产业领域的标志性特征,使华人方言社群与砂拉越产业开发建立起较强的联系。

(二) 华人方言社群与华人商铺建设

商铺不仅是华人经济活动的产物,也是砂拉越华人商务能力的象征。布洛克家族执政古晋期间,华人在砂拉越开设了大量商铺,它成为华人方言经济的另一类文化具象。华人商铺的布局往往集聚性出现,它们主要分布在交通便利的河流附近以及各地政府营署周围附近。布洛克时期,华人商铺的布局模式反映出其与当时砂拉越水路交通网络以及布洛克政府的政治扩张路径的一致性。

砂拉越地区河流众多,形成主干、支流发达、密集的河运体系,天然环境赋予了河流在商贸活动中良好的货运价值。在砂拉越的早期移民历史中,不少人选择在砂拉越三大河流流域落脚,并依赖河道实现商业贸易。布洛克执政前,潮州商人就已经利用河运深入砂拉越内地,同当地人以物物交换的方式进行贸易往来。被交换的物品收集到一定数量后,再送往古晋大巴刹进行交易^{[5]36}。在砂拉越,峇丹鲁巴河的上下游曾经是潮州人商业活动的主要区域,而拉让江一带则成为福建人主要的开发江域^[6]。天然的水上交通促进了早期沿河流域华人商铺的建设。他们以古晋市区为主要中转站,建立了较为系统的境内商业贸易网络。作为内外商业贸易的媒介,华人商铺在砂拉越地区不仅承担物资交换与经济交流的职能,在古晋政府的政治扩张中,华人商铺也协助政府巩固了新的政治版图,并逐渐建立起自己的经济领地。

查尔斯·布洛克继承古晋政权后,古晋政府不断向外扩张,政治版图及内河贸易持续扩大。二代布洛克每扩张一处新土地,均建立象征政治权力的堡垒(或政府营署)。新扩张的堡垒与华人在其周边建立的商业店铺成为当时与砂拉越共存的社会现象。早期的华商不仅利用优越的河道进行贸易活动,还将商业活动聚集区设立在政府营署附近。这种模式从首府古晋一直延伸至砂拉越内陆各省区。周丹尼^②在对布洛克时期政府城堡与商业市集的田野调查时观察到,华人商铺与布洛克堡垒在空间布局方面表现出相对一致性。如 1849 年,布洛克政府在鲁巴河支流建造第一个堡垒詹姆斯堡,在那拓荒的潮州人立即在附近

① 数据来源:刘宜强译《沙捞越早期史料钩沉》,劳越古晋潮州公会百周年纪念特刊,1966 年。引用自陈伟明、聂浩然《英属婆罗洲华人经济开发的进程与意义(1840—1941)》,云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 年 1 期第 85 页。

② 周丹尼于 1980 年 10 月至 1981 年 9 月在砂拉越地区实地调研。详见周丹尼著、黄顺柳译《砂拉越乡镇华人先驱》,砂拉越华族文化协会,1990 年,第 64—73 页。

开设五间店铺。由于地势较低,1864年,政府将堡垒重建于成邦江地势较高的位置,更名为爱丽丝堡。随即,商人们也跟着迁往成邦江。在西里巴士河的木中区域,商人们建立了巴刹,而木中巴刹附近同样也有政府设置的莉莉堡。1875年,随着诗巫的城堡建成,华人巴刹在诗巫地区也获得快速发展。1882年,查尔斯·布洛克取得峇南盆地的控制权,并建造了堡垒。不久,华人商铺在巴刹亦陆续出现。堡垒和巴刹成为砂拉越各个城镇政治与经济活动的主要区域。

在布洛克巩固与扩张政治区域的进程中,华人商铺的布局与政治扩张的空间发展呈现出高度一致性。堡垒与店铺分别成为古晋政府获取政治土地和华人获得经济地位的象征。政治堡垒的旗帜与华人商铺的招牌,为双方提供了独特的文化身份标识。前者象征布洛克政治领土的隶属确认,而后者则代表着华人在商业领域的空间认同,它们成为布洛克政府与华人在砂拉越地区扎根的空间符号。早期砂拉越华人视海外谋生为临时生活,目的在于赚取财富后早日归乡。而随着商铺的建立及日渐稳定,华人社群在民间的日常互动中逐渐产生了族群归属感,并获得当地社会的认同。

霍尔(Hall)认为,语言在历史文化的传播过程中发挥着媒介作用。在布洛克时期,华人方言群体与砂拉越的经济产业之间存在的互动,塑造了具有独特标志性的产业文化景观。华人方言群体所建立的商铺,以具体的物质形态使城市和乡村产生互动,砂拉越地区的日常民生也融入华人方言经济体系之中。华人商铺的大量出现,增强了方言经济在砂拉越多族群中的辨识度,华人经济在砂拉越的各个区域蓬勃发展。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商铺成就了华人与砂拉越之间在民间的一种持久性社会关系。

二、华人方言经济的地理空间价值

法国社会学家亨利·列斐伏尔认为,空间是群体为争夺特定社会秩序中地位的场所,而景观体现了社会关系。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列斐伏尔将空间视为一种能动的领域,并将空间解构为空间实践、空间表象和表征性空间^[7]。在砂拉越这个多族群社会中,华人方言经济不仅优化了区域经济空间新格局,还在政治维度提升了族群的发展空间,并在推动区域空间和谐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一) 方言经济与地理空间实践

19世纪,布洛克家族对砂拉越地区的政治格局产生了深远影响,同时,华人社群在经济领域亦取得了显著成就,实现了多领域产业经济的跨越。早期客家方言群是婆罗洲矿业开采中一支庞大的群体。19世纪50年代,石隆门的华人已达3000多人。巨大的产业经济利益甚至引起古晋政府的嫉妒,最终导致双方在1857年的大规模流血冲突。尽管经历了重创,但到70年代,石隆门地区仍有超过1000名华人从事矿产开采工作。以客家人为主体的华人对砂拉越的矿业开发贡献颇丰。广东人种植的胡椒与甘蜜分别在19世纪后期与20世纪初成为砂拉越主要出口的农产品。福州人在诗巫地区大面积开发的橡胶种植园,橡胶出口已占总出口额的87%^{[5]40-42}。学者田汝康在1948—1949年的当地调查中发现,海南人经营的古晋咖啡店在市场上的份额已达到88%。在商贸领域,闽南人通过发达的贸易,成就了他们在砂拉越强大的金融能力^{[8]276}。华人以方言社群进行产业开发,利用社群优势与砂拉越地区的农、工、渔、副产业深度结合,发展多门类产业,创造出地区优势产业,从根本上改变了砂拉越较为原始的“自然经济”,优化了砂拉越经济的空间结构。

华语方言以具体、可识别性的存在形式,将砂拉越华人从事的产业门类转化成具有空间意义的符号形态,进而建立了一个广阔的地域经济空间。从华语方言的分析视角,对砂拉越华人产业及其社群的地理分布进行观察和记录,可以为砂拉越政府制定经济政策和优化产业结构提供依据。其在产业类型分布上的独特商业价值,为各地华商从事砂拉越族群产业和开发投资提供信息支持,从而更好地增进互信,促进区域间商业发展与合作。

(二) 方言经济与政治空间互动

政治作为界定地理边界的一种手段,其空间特征塑造着人与区域之间的互动关系。布洛克执政古晋时期,政府曾以怀疑的态度看待华人社群,并实施了多项措施以限制其社会活动。以1857年石隆门华人

事件为例,客家方言社群与古晋政府两大权力体系的利益冲突及长期积怨不断激化,最终上升到政治冲突,导致千余名客家人伤亡,许多客家人被迫离开砂拉越地区。而政府在多个地区建立堡垒,名义上是欢迎华人开店经商,实际是以堡垒为核心对各族群进行管理控制。政府对砂拉越华人的制衡策略,始终贯穿于政治体系之中。

尽管对华人怀有警戒之心,但殖民者也认识到华人在砂拉越社会乃至整个加里曼丹岛的作用。1841年,文莱苏丹将古晋的行政权力转交给詹姆斯·布洛克后,便试图从布洛克手中重新夺回控制权。同时,古晋地区的本土部落,如伊班人等也不完全归服于新建的政权。在内外紧张关系中,布洛克政府意识到与华人结盟、进而平衡加里曼丹岛各界力量的重要性。于是,政府采取了积极的经济政策,大量华人迁入砂拉越地区。不过,华人也认为,唯有经济实力才是制衡布洛克政治权力的有效途径——“只有赢得政府青睐才可获得较高的社会地位,从而拥有政治特权”^{[8]275}。此后,华人通过“以经济换政治”的策略成为布洛克政府的“盟友”。石隆门事件之后,潮州社群与闽南社群从客家社群那里获得了古晋的部分利益,他们与政府合作,专注于经济发展,避免发生大规模对抗,为砂拉越华商营造了良好的创业环境。

华人依托经济实力换取政治空间的有利地位,得益于布洛克政府对华人较为有利的土地政策、商业经营许可以及管理法规。在查尔斯·布洛克继任为第二代执政者期间,政府曾多次颁布土地及垦殖法案。其中,种植奖励法案让利于垦荒者,以促进华人社群在砂拉越的融入与发展。土地法案惠及土地开发者,带来了产业的欣欣向荣。良好的政策导向为华人各社群在砂拉越的多种产业发展提供了政治保障。而华人社群在砂拉越建立的多样化商铺,不仅是其在政治领域获得话语权的物质基础,也是华人与布洛克政府进行抗衡的底气,更是华人在砂拉越多族群社会中获得社会地位的根本保障。

(三) 方言经济与区域文化融合

布洛克时期,政府设置华人管理制度,给予华人在自我管理上的相对权力。政府对华人社区的自治亦高度认可。根据当时的管理模式,政府在不同地区设立了甲必丹(Kapitan),将管理职能下放至族群内部,由族群领袖负责管理各族事务。在这种管理体系下,华人不仅在政治领域享有一定程度的自我管理自由,在经济领域也获得了相对宽松的经营自主权。以方言为纽带的华语社群,构建了“社群成员—甲必丹—总甲必丹”的自主管理模式。这一模式为华人商铺的聚集及商业活动的开展提供了广阔的自主空间。在社群内部,社群头领优化族群关系,增强群体间的凝聚力,和谐的族群成为砂拉越社会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族群与社会关系上,华人社群以商铺形式参与砂拉越的社会生活。从早期与当地族群进行简单的物物交易,到在较为偏远的地区开店设铺,为各族群提供商业服务,华人与砂拉越各族群保持着良好的日常交流。一些华人社群及华人商铺在砂拉越地区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发展态势,闽南方言甚至一度成为古晋金融贸易领域重要的沟通媒介。古晋市区的海唇街和亚达街,以及浮罗岸路沿线等,至今华人商铺依然密集,这些均是华人经济在砂拉越地区拥有强大生命力的体现。华人在砂拉越的社会贡献一度受到当政者查尔斯·布洛克以及官方媒体《砂拉越宪报》的肯定。在推动砂拉越社会发展、提高城市经济实力以及促进砂拉越社会文明的共建共享过程中,华人以遍布各地的商铺为交流载体,在砂拉越日常生活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华人商铺成为华人各方言社群日常生活经验交流的重要场所,它不仅是华人在砂拉越社会确立自我存在感的一种显性符号,也是华人在经济领域中拥有社会地位与话语权的空间象征。

三、华人方言经济的人文空间价值

砂拉越地区华人方言经济在实现族群精神的自我表达、族群文化认同以及族群的地方性文化构建等方面,亦展现出其独特的人文价值。

首先,砂拉越华人方言经济是展现海外华人自我奋斗精神的典型范例。

布洛克政府通过实施一系列土地政策,成功吸引了大量移民参与土地开发,从而促进了包括客家人、福州人、广东人以及兴化人在内的多个方言社群的经济活动。在各方言社群的不懈努力下,客家人农垦区、福州人农垦区、广东人农垦区以及兴化人农垦区等创业区^[9]相继创立,且多类产品被华人开发成砂拉越的主要出口商品。如福州人与橡胶经济、兴化人与古晋渔业及交通运输、海南人与咖啡经济等。方言社群与经济门类的互动彰显了华人各方言社群与砂拉越不同经济产业之间的相互作用,他们为砂拉越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正是华人社群的努力与倾力创造,才使得华人经济成为砂拉越地区一道独特的社会风景。华人的勤奋精神和奉献意识,对世界华人而言具有强烈的象征意义,它启发后代创业者继承和发扬先人的务实态度以及积极上进的朴素品质。

其次,语言不仅仅是沟通的工具,也是文化认同与族群遗产的体现形式之一。

砂拉越方言经济的繁荣凸显了华人社群对中华文化的坚守,揭示了语言除沟通功能外的深层价值——文化认同与族群遗产^[10]。Gudykunst and Schmidt 认为,语言影响民族认同的形成,民族认同也影响语言态度和语言使用^[11]。砂拉越的多元语言环境彰显了华人族群的聚集能量,在本质上也表明对家乡语言文化遗产的继承功能。即便背井离乡,华人依然保持着对乡音及民族文化的坚守。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不仅利用方言交流,还坚持使用汉语文字作为商业标识,如商号“长盛发”“丰源号”“振义号”“长吉号”等^[12],以及战后延续的各种华语商号招牌如“兴茂”“越华洋服”“广利银行”“金泉安有限公司”^[13]等。方言与华文商业招牌的使用不仅是对母语文化的认同,也蕴含中华语言文化在海外代代相传的信念。在一些商号命名中,华人往往倾向于选择具有庇佑以及自我祝愿意蕴的字词。如“金泉安公司”,寓意着对经济收益期许的同时,也充满对家国的思念情怀。中华语言文化在海外的继承与传播,已然成为海外营商社群世代相传的文化遗产。

最后,华人方言经济对于砂拉越地方性的构建也发挥着积极作用。

所谓地方性构建,其核心在于空间意义的形成,而这一过程源自人们的行为实践。不同的行为主体在空间中的实践活动,促成了地方性的动态变化与意义的流动^[14]。作为多语言社会,砂拉越地区集合了马来语、英语、华语、印度语以及其他族群的语言文字,这些共同组成了砂拉越社会语言文化。方言经济作为族群文化的一部分,首先代表的是华人与华语的社会形象。无论是方言经济还是商号文化,都是华人各社群海外交流与发展的中介。语言文化一方面留存了华人对家乡及宗族的记忆,同时也融入当地文化,为砂拉越区域文化注入新的活力。通过群体间的交往,华语充分发挥了促进砂拉越跨族裔间信息交流和文化共融的功能,加深了彼此的理解与信赖。方言经济在文化功能层面对丰富砂拉越地域特色文化、提升区域性交流以及增强社区凝聚力方面具有积极意义。

四、结语

19世纪以来,砂拉越地区的华人经历了从个人奋斗到多社群集体发展的转变,他们与布洛克政府一起,共同推动了区域经济的发展,并与砂拉越各民族共享劳动成果。华语方言经济记录了华人迁徙、奋斗的历史轨迹,也见证了当地经济快速发展的历史时刻,在砂拉越社会发展与海外华人精神内涵方面创造了独特的空间价值。砂拉越方言经济及其人文特征,不仅突出语言作为交流工具与辨识社群的功能,也推动了砂拉越经济结构的优化,并在政治生态中为华人争取了社会地位,促进了族群间的和谐与文化融合,这些为了解华人在海外的经济活动和社会融合提供了新的视角。同时,华人方言经济也承载了族群文化传承与文明社会共建的深远意义,为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在海外传播提供了形象化的展示,也是中华语言文化融于世界大家庭的一次具体实践。如今,砂拉越地区已成为亚洲海上“一带一路”经济倡议中的重要区域之一。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在马来西亚东部乃至整个东南亚海上丝绸之路中均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华人社群、华语以及华人经济在砂拉越地区的融合经验,为各国经济交流与文化互鉴也提供了有益参考。

参考文献:

- [1] MADJID M D. James Brooke And His Attempts To Instill British Power In Sarawak In The 19th Century[J]. Jurnal Pengetahuan Islam, 2023(2): 108.
- [2] 山下清海. 東おける華人方言集団の分布の形成[J]. 地学杂志, 1982(5): 342-349.
- [3] 田英成. 沙撈越華族社会的结构与形态[M]. 吉隆坡: 华社资料研究中心, 1977: 64.
- [4] 陈约翰. 砂拉越华人史[M]. 台北: 正中书局, 1985.
- [5] 刘郁忻. 砂拉越古晋巴刹华人方言群及其产业: 1840-1950[D]. 新竹: 台湾交通大学, 2016.
- [6] 王颖, 王元林. 砂拉越华人移民及其分布格局探析: 1830-1930[J]. 东南亚研究, 2015(5): 78-79.
- [7] 亨利·列斐伏尔. 空间的生产[M]. 刘怀玉, 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1: 51-59.
- [8] TIEN J K. The Chinese of Sarawak: Thirty Years of Change[J]. Japanese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1983(3).
- [9] 陈乔之. 白色拉者统治时期沙撈越的中国移民概说[J]. 暨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1(2): 67.
- [10] NNAEMEKA O C, ADEYINKA B O, OLUWASEUN J N, et al. Political Economy of Language: Linguistic Perspectives on Economic Policy[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vanced 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 and Studies, 2023(4): 187.
- [11] GUDYKUNST W B, SCHMIDT K L. Language and ethnic identity: An overview and prologue[J]. Journal of language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7(3/4): 157.
- [12] 张青阳. 砂拉越拉让江流域华人商业发展研究: 1861-1963[D]. 泉州: 华侨大学, 2020.
- [13] 廖升. 砂拉越古晋商业年鉴[M]. 古晋: 沙撈越中华古晋总商会, 1965: 76-94.
- [14] 张景霓, 王佳赫. 文化性地方性与现代性: 多模态旅游语言景观的功能与规划[J]. 社会科学家, 2022(3): 60.

责任编辑: 李秀义

**A Study on Economic Activities and Spatial Value of Chinese Dialect Community
in Sarawak during the Brooke Period**

LU Zheng

(School of Literature, Minnan Normal University, Zhangzhou 363000, China)

Abstract: During the Brooke Period, a large number of Chinese immigrants moved to Sarawak. They identified themselves through dialects and participated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Sarawak, forming a spatial landscape that Chinese dialects and Sarawak's economic sectors resonated with each other. With the expansion of the Brooke regime's territory, Chinese shops, emerging continuously in the form of bazaars, became a distinctive cultural landscape of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the daily life of Sarawak society. The economic industries and shops distinguished by dialects constituted a unique agglomeration pattern of Chinese economy in the Brooke era, which shaped the unique regional and cultural values of overseas Chinese immigrants in the dimensions of geographical space, political space and daily life space.

Keywords: Brock Period; Sarawak; Chinese dialect commun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spatial value